

中国文学在日本

中国文学在日本

严绍璁 王晓平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插页 320,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册

ISBN 7-5360-0668-3/I·609

精装定价: 8.30元

文化交流的双向反应

——《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总序

乐黛云

交流总是双向的。过去，我们对外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作过不少研究，但对于中国在外国的形象、中国对外国的影响，以及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都研究得很不够。

其实，数百年来，中国文化已深深渗入西方文化之中，成为推动西方文化发展的主要契机之一。自1585年西班牙人撰写《大中华帝国史》以来，中国就以一个极其强大、发达、一体化大帝国的伟大形象出现于世界。这部书七年内就以七种语言出版过四十六次，可见西方对中国兴趣之一斑。十八世纪，中国艺术促进了欧洲艺术风格的转变，形成了欧洲建筑史上的“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装饰、丝绸及其他发明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欧洲风习和制造业的革新。中国文学激发了伟大诗人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宏伟构想，他呼唤德国人努力理解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十分重要、十分宝贵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文学中相当活跃的题材。诸如马尔罗的《人的命运》（法），和巴拉德的《太阳

帝国》(英)描写了北伐革命和抗日战争;庞德的《诗章》以中国为重要组成部分展开了人类历史的图景;卡夫卡的《万里长城》(捷),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德)、卡内蒂的《迷惘》(保加利亚)、博尔赫斯的《歧路园》(阿根廷)等都将中国纳入其象征体系而在其民族文学中享有盛誉。庞德甚至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当然,在西方文学中也不乏负面的中国形象,如沃珀尔的《象形文字故事集》,笛福的《鲁滨逊思想录》。

关于中国的研究早就构成了世界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莱布尼兹、伏尔泰、布朗杰、黑格尔、马克思宾格勒、韦伯都曾对中国的成就和弱点,特别是它的长期停滞作过深邃的探究。他们的思考至今仍富于启迪。俄国瓦西里耶夫院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阿里克谢夫院士的《一部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1906)都称得上是开创性的鸿篇巨制。其他日本、朝鲜各国对中国的研究著作就更是数不胜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苏、日涌现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者。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洞见常常开辟了新的研究层面。

的确,国外的中国形象有美有丑,中国对外国的影响时强时弱,在世界文化对话中,中国的声音或抑或扬……研究这一切,探索其规律,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很富于挑战性的极待开垦的领域。首先,这对于客观、清醒地认识“自我”有无法替代的意义。苏格兰诗人彭斯早就祈望有一天“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当代理论家哈伯玛斯强调“互为主

观”是突破封闭体系、是更新重构的前提，因为在自己的体系中观察自己，很难发现问题。其次，这种研究又是很好了解对方的途径。两种文化的汇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里首先发生的是一种“文化过滤”现象。任何文化接纳外来文化，都会摒除自己难于接受的部分而只作有选择的认同。这种选择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人们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不满，就会构造一个“非我”来与“自我”相对立，把一切理想的、圆满的，在“我方”无法实现的品质都投射于对方，构成一种“他性”而使矛盾得到缓解。这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对方的现实，而是我方的需求。欧洲“三十年战争”前夜的混乱时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绝望年代都形成了对中国美化和理想化的高潮就是一个明证。当然，有时“他性”也被投影为最黑暗、最可憎的负面形象而大遭挞伐，目的是增强“自我”的信心。因此，不断变化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总是理性分析与虚构想像掺半，赞美与指责也都不全合乎实际。然而，正是这种“不合实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对方的钥匙。最后，还应看到两种文化的“认同”决不是靠一方的完全失去原有特色来实现，决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同化”和淹没，如果两方完全相同，就会失去“交流”意义，无法产生新的因素。“认同”，应是歧义在同一层面的“共存”，这种“共存”形成张力和对抗，正是这种张力和对抗推动事物前进。同时，这种“共存”中的外来文化又与过去不同，这里必然存在着大量“误解”，改造（或曰歪曲）和变形。一种文化受益于另一种文化，正是通过这种“误解”，改造和变形，亦即本民族文化的折射来完成的。自觉研究这种“误解中的共存”

对于理解文化汇合的规律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显然都有重要意义。特别在目前所谓文化转型或文化重组时期更其如此。

我们奉献于读者之前的这套《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只是以上种种构想的一个方面，也只是一种初步尝试。丛书拟出十本，除今年作为国庆四十周年献礼的中国文学在法、俄、日、朝四本外，尚有明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在美、英、德、越、东南亚、东欧六本。虽只是初步尝试，这部丛书已得到多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年已八旬的世界比较文学大师法国艾田蒲教授千里迢迢专门为丛书写了序。花城出版社更不顾亏损，慨然允诺承担全部出版任务。这一切都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感动。丛书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共同编写，也期望能收南北呼应，通力合作之功。正是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大季羨林、杨周翰教授的大力支持，这一合作才得以圆满实现。一并在此深志谢意。

序

〔法〕艾田蒲 (Etiemble)

我在巴黎大学讲授法国十九世纪某一大的文学运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浪漫主义，也可能是象征主义）时，经过仔细地反复阅读文学作品和有关的学术著作，我对人们给我提出的课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当然，这里并未涉及到什么专门术语，而是讲述了一些基础性的文学通史及其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我也扼要介绍了文学巨厦中的各种倾向和流派，甚或小的文学团体。学生们专心地作了笔记。

报告以后，我声明：“我所参考及引证的文章都借之于你们称之为纪元前的中国文学。”这番话令四座皆惊。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无可辩驳地指明了那些带着高傲口吻谈论“黄种人”的人是多么愚蠢而卑鄙；此外还肯定了我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成果使我耗去了六十个年头，我尽可能多地研究了各国文学，以便从中证实我所称之为“不变的原则”：我们人类基本一致的无可辩驳的佐证。

我在《七星文库》所翻译出版的两卷盒装的三部伟大的中

国小说和其它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三部小说是《水浒》、《红楼梦》和《金瓶梅》。我主持编译的《东方知识丛书》，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六十五种出版物中，中国作品就占十七种。我即将要翻译出版的是苏曼殊的作品，1988年年底要翻译出版陶渊明诗全集，还有一厚卷有关中国文明的书籍。即使这些作品还在印刷尚未出版之前我已离开人世，但出版协议已经签定。就目前我的计划的进展情况而言，一切合同至1990年底会全部实现。

况且，我的这套丛书以后也要出惹人喜欢、价格便宜的袖珍本，一切爱好中国文学的人，只要花几条烟卷——毒品——的钱就能买到这些书。以美攻毒，这一中国文学，可见是多么了不起的戒毒之佳品！

1988年11月27日

巴黎

（钱林森译）

Content

Chapter one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to The Eastward Spread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1. The Asuka-Narat Era (the 5th—9th century A.D.)

The way of Dissemination—with the Exchange of Races as a Natural Channel

2. Heian Era (the 9th—12th century A.D.)

The Opening of the Direct Channel to the Contacts of Sino-Japanese Culture—with Aristocratic Intellectuals Leading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3. Gozan Era (the 13th—16th century A.D.)

The Tendency toward the Mutual Complemen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Medieval Culture with Zen Monks Leading the Way of Communication

4. Edo Era (the 17th—Mid-19th century A.D.)

The Emergence of Merchants

Chapter Two: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Part I): Various Chinese Literary Forms in Japan:

1. The Formation of "Japanized"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Early Chinese Poetry in K-aifusō
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rly Chinese Fiction in Jap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ashlmakode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3. The Japanese Eulogy for "Chinese Literary Styles" in the Heian Period: Chokusensansuo
4.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ese Zen Buddhism: Gosan Literature
5.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do Period: Literary Works by the Japanese Sino-logists

Chapter Three: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Part II): Japan's Mimetic Literature

1. Chinese Folklore in Japanese Buddhist Parables during the Heian Period
2. Transformed Ming Dynasty Romance in Kanasōshi

3. Feng Menglong's "San-yan" in Tsugateisho's "Shandan"
4. "A Tale of the White Snake"
5. The Chinese Novel Water Margin and Chushinsuikiden in the Edo period

Chapter Four: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part III): Japan's Monogatari

1. The Myth of Kojiki (古事记) and Nihonshoki (日本书纪)
2. Takeuchi Monogatari
3. Genji Monogatari

Chapter Five: A Historical Account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Part IV): Japan's Yamatouta

1. The Lyric Forms of Waka
2. Manyo and Tang Poetry
3. Matsuobasho's Haiku

Chapter Six: The Modern Japanese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 The Decline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Japan at the End of Bakumachu and

the Beginning of Meiji

2. Tsubouchishōyō's Criticism of Novels of Morality
3. The Adap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Chapter Seven: Japanese Scholars' Views on Lu Xun's Works

1. Japan's Early Research on Lu Xun
2. Japan's Nihilists' Views on Lu Xun
3. Early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Lu Xun and Marxist Views on Lu Xun
4. Japan's Neo-Idealist and Naturalist Views on Lu Xun
5. Takeushi on Lu Xun
6. Postwar Neo-Positivist Studies of Lu Xun

Chapter Eight: Chinese Left-Wing Art and Literature and Japan's Proletarian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Taisho Period and the Early Showa Period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s Proletarian Literary Movement and Left-Wing Sino-Japanese Art and Literature
2. A Literary Medium: The Left-Wing Litera-

ry Movement by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Chapter Nine: The Spread of China's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in Postwar Japan

1. The Special Implication of China's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in Japan
2. Self-Criticism in the Postwar Japanese Cultural Movement
3. Japanese Study of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4. The Significance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Spread of "People's Art and Literature" in Japan

Chapter Ten: The Exchan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mporary Sino—Japanese Literature

1. The Current Japanese Way of Life and th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2. The Rise of Sino-Japanese Stud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3.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Future of SinoJapanese Exchange in Literature

前 言

中国文学研究，自然需要放在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深入探讨，不能脱离对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深刻理解。不过，在封闭的批评体系中，人们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把文学传统描述成孤立、单调、凝滞的概念。当人们的思维一旦突破了闭锁的藩篱之后，各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往、碰撞和渗透的生动事实，就会显露出来，给人们以启示。我们把中国文学看成自己文化风土中的果实，又把她当作世界文学中的一个公民，就会惊奇地发现，她曾经走过或正在走着与其它公民相似或相关的路径，而她自身鲜明的特征与不可替代的价值，也就格外地醒目。

今天，已有一些人走出城堡，热心起研究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吸收与借鉴异国异民族文学的规律，思考着中国文学在异国异民族的历史命运。更多的人对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抱着读读看的心情，期待着从中或许能够找到启迪思维的酵母。因而，对中国文学在国外的流传学、媒

介学与国外研究的研究，都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历史的认识。其中，“中国文学在日本”这一课题，特别引起我们的兴趣。

日本保存至今最早的汉文章，即是《倭国王武（即雄略天皇）致（刘）宋顺帝表》。从那时算起，中国古代文学传入日本，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入日本文学的机制内，成为其发展的内在因素，已经有一千五百余年了。中国历代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以及文学理论著述传到日本的数量，难以历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日本民族语言书写的文学，即假名文学，是在贵族汉文文学兴盛之后才出现的。当时的贵族借用汉字记录和歌，撰写公文，作日记，载传说，缩短了从口头文学时代到书面文学时代的距离，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正是奈良平安时代的文学家，结合本民族语言特点和审美心理，创造性地发挥了汉语言文学的再生能力，同时又不断地冲破外来语言和文学样式的束缚，迎来了和歌、物语和日记文学的繁荣。类似的现象还可以在其后日本文学发展的若干阶段中，例如在江户时期前近代小说及小说理论的发展中看到。

日本古代许多文学家，都把钻研中国古典当作修养的重要内容。《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自不待说，就是中世纪那些不留名的军记物语的作者，也都以熟知中国古典而自豪。日本作家对中国古典的引用，当然不仅是语言的借用，常常是连原典的深厚文化内涵一并借入，以达到强烈的暗示效果。阅读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模仿——仿构、反仿、内仿，直到化入内

心，借用而不露形迹。司马迁、白居易、苏轼、冯梦龙、罗贯中、施耐庵、袁枚等是在日本最享盛誉的中国作家。明治维新以后，新文学的开创者森鸥外、幸田露伴、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泉镜花等，也都曾经从中国文学中吸取创作素材和技巧。日本人学作中国古典诗歌散文，也创造了中国诗歌中极少见到的新的诗歌品种——狂诗、狂文，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案，更有着种种增衍、“损耗”和“变味”。一般说来，政治教化色彩、道德伦理色彩、历史实录色彩显著淡薄，语言、结构的修饰性、均衡性、严整性相对降低，种种文学观念也变得缩小化、情绪化，相反，文学自娱功能陡增；某些细部更加精微。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分析，《玉台新咏》、《游仙窟》、《剪灯新话》这类作品在日本受到特别的青睐，也正是日本人独特审美心理的反映。这些作品，在日本表现为一种“超越影响”，即它们在日本的影响，反而超过了在中国的影响。

大胆地接受和消化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日本文学的显著特征。日本文化的基本特点——变异复合性，在日本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中也有突出的表现。中国文学之所以在日本发生反响，终究取决于日本民族的需要——时代的与历史的、政治的与文化的、社会的与接受者个人的，等等各种需要。在向世界文学的进军中，一些日本作家表现出奋进自省的精神与唯恐落后、一步不让的危机感与紧迫感。从极其认真地模仿——先是对汉文学，后是对西方文学——最终走向外来文学营养的“内化”，其间常常经过种种混合体、夹生体的阶段。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日本学者从民族自省的角度对鲁迅

的研究,以及战后,对中国的“人民文艺”的研究,其中都可以看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当然,有些学者自矜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大国”的国民自居,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采取鄙视的态度,其实,这也正是日本民族性的又一面。

在历史上,日本文学始终吮吸着汉文学的有益营养,以形成富于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另一方面,日本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反馈”,也对作为放送者的中国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回返影响”。唐代中国诗人互相唱和,颇多佳话,而明清时代传入我国的汉诗汉文更多,诸如《拙堂文话》、《渔村文话》这些日本人研究中国古文的著作在同治、道光年间已在我国流传。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在近代人文科学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下,努力垦拓,在中国文学的诸领域中,都曾有过杰出的贡献。诸如儿岛献吉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盐谷温、青木正儿,直至吉川幸次郎的著作,在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颇具影响。

中国文学由汉字的东传作为前驱,又有以宗教(主要是佛教)作为驿骑,乘着中古世界文学交流的潮流,获得了在日本开花结果的契机。在古代东方文学的世界环流中,佛教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它传播的过程中,大量借助于文学的手段,而文学也随它穿越国界,从而赢得了各种文化相互交往、融汇的良机。这或许正是靠着汉译佛典的东传和僧侣的西来,印度、西亚乃至欧洲的文学才获得了在古代的中日两国留下投影的重要条件。

从整体上说,从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直至江户时期中叶的